

• 社会学研究 •

灾害、现代性和社会变迁

刘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尝试以汶川地震为主要案例, 结合国内外多个其他灾害案例, 阐明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两大视角, 分别为灾害和现代性视角, 以及灾害和社会变迁的视角。论文指出, 人类行为的在先性(human prior activity) 已经成为灾害生成的一个最主要的社会机制, 因此, 人类认知和行为改变, 以及人类普遍的灾害预防努力, 便成了我们理解灾害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内容; 其次, 民族国家内部救灾努力的系统化和制度化, 以及危机后紧急规范的引入, 也是例证灾害与高度现代性之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第三, 整个救灾社会过程的逐次展开, 同时也是低度现代性和高度现代性相互遭遇的一个重要场合, 因此构成了社会科学家实地观察社会互动的一个良好案例。在把灾害导致的社会变迁(及其后果) 区分为三个层面——灾害相关的宏观社会动力机制、灾区中观社区形态变迁和灾民微观适应行为——之后, 论文也对汶川地震所引发的多个类型的社会变迁做了细致分析。

关键词: 灾害; 现代性; 人类行为的在先性; 紧急规范;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18)04-0066-05

从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视角来看, 可以把灾害形成和发生过程, 以及随后的救灾、重建、心理创伤弥合的整个过程, 看作是具有重要现代性意涵的社会事实。随之而来另一个话题, 便是要去探究灾害和灾害应对所引发的、扩散的中长期社会变迁。在本文中, 汶川地震, 以及2008年冬天中国南方的抗击暴风雪的全国性动员, 都可以是很好的微观案例, 用来说明灾害社会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视角。

一、灾害和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首先我们把灾害分为主要由人类活动因素引发的和主要由地球的气象、地质和相关物理

化学过程所引发的两个大类。前者最典型地体现为植被破坏与泥石流滑坡之类的自然灾害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水体污染、高层建筑火灾等事件中, 人类活动的在先性; 后者则更多地指向地震、火山爆发、极端气候(台风、飓风、热浪、洪水和长期干旱)等似乎与人类活动并无直接关联的灾害现象, 尤其是地壳活动所引发的那一类。当然, 后者的高频度发生, 也许和人类行为有关, 因为诸如温室气体排放、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之类的人类在先活动, 或许是引发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前提条件。

毋庸置疑, 把人类在先活动(human prior activity) 看作是大多数灾害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实际上已经开启了灾害和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讨

收稿日期: 2018-04-25

作者简介: 刘能(1970—), 男, 浙江嵊泗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社会运动 and 集体行动、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

论。德国社会学家 Ulrich Beck 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被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其他特征还包括工具理性的暴政和新型异化类型的社会建构等),Beck 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不得不将处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核心议题来看待(Beck, 1992)。灾害无疑是典型的不可预知的风险,涉及对生命、财产和人类尊严的严重威胁。因此,认识到人类在先活动和灾害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联,为人类预防和干扰某些灾害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治理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体系做出自我审视和自我约束。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和人类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联一旦被认知,那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便成了现代性意涵下,人类自我约束和自我拯救的一个主要宏观干预方向。

因此,灾害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第二重含义,便是灾害公共教育和人类行为及认知改变。高层火灾预防、地震震后次生灾害(如公共卫生危机)的预防,以及救灾物资的储备、救灾团队的训练和国际合作、灾害信息的预警和传播等,便是高度现代性的(高度理性、讲求效率、讲求生命价值等)。与此相对应,便是诸如火灾演习(fire alarm drill)、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台风紧急疏散计划之类的应对灾害风险的实际行为的习得、传播和制度化。

第三个关联之处,则建立在本人对汶川地震、抗击暴风雪等个案灾害社会处理和应对过程的观察之上,那就是救灾努力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的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美国学者对 2001 年“9·11”事件的民族志研究便指出,围绕应急救援的各种集合式努力,最终在灾害所引发的社会失序之外,迅速建立起一种紧急规范(emergent norm,最早见于 Turner and Killian, 1984)和紧急秩序(参见 Schaefer, 2006: 9)。因此可以说,救灾过程所产生的紧急规范,是印证灾害和现代性之间关系一个很好的经验证据。2011 年,作为红基会汶川地震灾区援建项目评估团队实地调研核心带队长,本人在四川彭州白水河社区以口述史的方式重构了地震之后社区秩序恢复的时间线:除了本能的

自救行为之外,灾民们远远看到解放军战士出现之时,就知道整个社区已经得救了。因此,国家制度化救灾努力,在灾民心目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含义;而受灾民众的解读,则是灾区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认知维度。对汶川地震和抗击暴风雪两个案例的微观观察,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一制度化救灾努力当中,至少包含如下现代性因素:随着灾情演变和灾害数据的采集,政府各部门分别启动专业救援方案,从应急口(地震救援队)开始,逐渐涵盖军队、民政、交通、电力、卫生、水利等专业力量,后期则牵涉到灾害心理危机干预、身份识别和信息共享(寻人、遇害者身份登记等),以及灾区治安保障等,另外还涉及物资分派、救灾 NGO 和志愿者统筹管理,甚至特殊任务小组(如核安全调查小组等);最后,则还有对口支援和灾害重建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我们获得了关于国家行政力量如何一步一步卷入到灾害应对和灾害管控过程中的微观证据。这种制度化应对的整个生态体系,便是当代社会高度现代性的一个突出体现。

第四个关联之处,既是在描述灾害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两个社会世界的相互遭遇(encounter):来自一个社会世界的高度现代性,渗透或扩散到另一个社会世界之中,从而使得救灾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也是高度现代性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逐渐由核心地带向边远地区扩散的过程。从汶川地震来看,其发生地,是夹在四川盆地和横断山脉之间的一个边远山区地带^①。地震发生后,包括军队、地震救援队、医疗队和地质灾害处置小组等专业团队的出现,则似乎构成了一个来自遥远外部世界的,以技术理性、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为其根本特征的社会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灾民临时安置点的建立和当地救灾体系的建构,就是这两个看起来相差极大的社会世界相遇的一个结果。灾害所在地的受灾民众,密集地遭受到了一系列现代性(理念和实践)的辐射:救灾医院中病人的数字化管理(手环和条形码的使用),医疗机构变成了将初级关系转换为次级关系的科学

^①笔者曾经于汶川地震发生之前的 2007 年,在四川阿坝州理县进行过社会调研和考察:从都江堰出发,经过茂县到达理县的整个交通沿线的所见所闻,以及当地羌族的文化特色,都在告诉笔者,这是一个相对隔离且有着自身特殊属性的社会文化世界,社会经济生态和文化认知体系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空间;灾后公共卫生条例的颁布,现代预防医学的理性原则,又成为约束受灾群众“本能行为”的一个重要指针。而当地灾民们面对灾情的坚韧不拔的文化精神,也通过大众传媒的各种介质(图片新闻、照片、特写和视频等)传递开来,使得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回应,成为全世界灾害应对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定的救灾过程,至少从两大社会体系相遇的角度来看,是文化沟通(cultural bridging)和现代性扩张(the extension of modernity)的混合体。

二、灾害和社会变迁:三个维度的考察

灾害和由它引发的社会后效(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某些读者所想象的那样显而易见。两者间的关系,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要去看灾害发生之后,受灾地区的哪些社会行为和态度,以及地方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中的哪些部分发生了变化;主流社会又是如何来消化、容纳和评价这一灾害的长期效应的。另外,沿着我们刚才关于灾害和现代性之间关系的陈述,要去看现代性扩散到受灾地区之后,又有哪些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变迁在潜移默化地发生。

社会科学史上得到较密集研究的一个案例,是1986年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环境医学科学家跟踪研究了切尔诺贝利地区受事故影响范围内居民的健康衰减和健康异常现象(Baverstock and Williams 2006),艺术家则用自己的独特方式记录了当地社会经济衰败的整个轨迹,以及当地居民的各种适应性行为,如外迁、隐藏身份以避免受到污名化和排斥、抑郁和精神疾病的爆发等(Ludwig, 2014);另一些学者则考察了核电站事故对邻近国家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社会运动成长的影响(Harper 2001)。最近的一个例子,则是2013年东日本海啸受灾地区(以及特别地,福岛核泄漏地区)的社会经济衰败过程:政府救灾努力的不足和迟滞,使得受灾地区灾民至今仍旧过着流离失所的寄居日子。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家更为关注的则是,受灾地带的社区地方认同感,由于地方生计体系的崩溃和居民的分散安置,逐渐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另一个案例,

就是2003年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风灾:由于政府救援迟滞,损失严重。美国社会学界受到很大震动,将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学,分别称为前卡特里娜时代的社会学和后卡特里娜时代的社会学,认为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以自由主义姿态对待福利和救灾义务的态度和立场,是造成灾区人民深重灾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并针对后卡特里娜时代新奥尔良的恢复重建做出了针对性的研究(Picou, 2009; Gotham and Campanella 2013)。因此,后卡特里娜时代的社会学,要将社会平等、正义和普遍的福利救济思想带入到社会学的核心学科实践之中,而这恰恰也是200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Michael Burawoy提出他的“公共社会学”概念框架(Burawoy 2005),并在之前被选为2004年度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一个深刻背景原因。

因此,当我们以汶川地震这一案例来做类似询问的话,究竟有哪些议题会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启示呢?我们将灾害导致的社会后效和社会变迁,分成三个层面:灾害相关的宏观社会动力机制的层面;灾区中观社区形态变迁的层面;灾民微观适应行为的层面。并据此对汶川地震潜在社会后效,以及后续救灾行动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做概要阐述。

1. 宏观层面的社会后效

首先,汶川地震爆发之后,国内学界最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带领民政、社工、灾后心理和慈善救助等各方面的力量,直接介入到地震救援中去。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一些带有行动研究意味的项目也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社区重构(北京地球村的大坪社区)、社区陪伴(中大绿根的白水河社区)、团队励志(中青院的绵阳青红项目),再到社区团结的促发和塑造(华东理工的都江堰项目)等(具体案例,请参见刘能等主编2012)。救灾过程中,NGO救灾联合体的成立,也使得汶川地震成为国内第三领域自主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证据。一年之后,拉丁美洲岛国海地发生地震,当地救灾资源的缺乏和国际援助的效率低下,使得国际观察者发出感慨,认为对照中国的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的救援实践,前者所隐含的强国家动员模式的社会优势显而易见。由此可见,从最宏观的社会变迁及其扩散后效的层面来看,汶川地震不仅

成为国内第三领域自发成长的一个标志型推动事件,也使得它成为国际比较背景下验证社会制度比较竞争力的一个强有力证据。

2. 中观层面的社会变迁

灾后重建的另一个中观社会变迁事实是,低地汉族聚居区的微观社区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而高地民族聚居区的社区功能类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上述判断,部分地来自于本人2011年夏天带队在汶川地震受灾地区(包括彭州、都江堰、绵竹和绵阳等地)进行恢复重建项目绩效评估时的田野考察观感,部分地来自于对其他学者相关研究活动的阅读(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罗家德教授在羌族聚居区的轻钢房建设项目和社区研究计划^①)。

总的来看,汶川地震灾区的重建活动,大概有两到三个结构性力量在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是震区房屋结构的抗震性能和环保性能的提升,因此,无论是北京地球村在彭州大坪的重建项目,还是罗家德教授团队在茂县云村的社区重建实验,都将引入新型建筑设计模板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借鉴来自台湾的经验,成为灾后重建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此外,在震区某些县市,灾后重建也成为地方政府重新规划地方空间和聚居形态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我率领研究团队从大坪赶往白水河的一路,我们看到了低地汉族聚居区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原先分散居住的农村社区,已经被纳入了一个连片建筑集中居住的建设框架之中:尤其是途中经过的小鱼洞镇,已然成为一个新型的高密度聚居区。可以说,之后风靡全国的农民上楼现象,实际上它最早的大规模采纳,就是在汶川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之中。第三个结构性力量,不得不提到中国特有的对口支援制度:在各省市对口支援灾区某个地级市的框架下,省际竞争使得汶川地震灾区的重建过程充满了符号性和政治性,而援建标准的提升和工期压力,则成为这一竞争过程中的两个主要着力点。

灾区恢复重建中集中连片聚居的事实,在都江堰城区、彭州、绵竹、绵阳安县几乎都得到了证实。进一步的社区调研,则让我们了解到集中居住给社区管理层面带来的挑战:20世纪

90年代末我在山东济南城乡接合部做博士论文时所遇到的物业费收取难题(刘能,2008),在2011年的汶川地震灾区又重现了。因此,汶川地震的恢复重建活动,在客观上高强度引入城镇化因素(上楼、非农就业和消费的现金化)的同时,又反映出文化和认知领域的堕距(culture lag,参见Ogburn,1966^[1922])。与低地汉族聚居区社区居住生态的改变相对应的,则是高地民族聚居区社区功能形态的演变。而高地聚居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不仅仅是社区物理受损维度(如房屋、道路和重要功能性建筑)的重建,也不仅仅是社区整体上的心理创伤的弥补,同时也是社区生计体系重构的一次良好机会。国际小母牛组织试图将舍饲技术引入到龙门山脉深处的受灾社区,北京地球村将“乐和文化”和生态农业引入高海拔的大坪村,以及羌族聚居区社区重建规划中对本地民族特色旅游文化资源的全盘规划,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尝试中的典型案例。可以说,随着恢复重建工作的启动,目标社区的功能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3. 微观层面的社会适应

本文中,将灾区民众针对灾情损失和围绕灾后重建所形成的个体和集体认知,以及建立在此类认知基础之上的行为偏好和实践,看作是具体而微的微观适应。简单来说,汶川地震所引发的微观社会适应行为,主要包括如下几类:地震灾区作为故乡的概念演变;地震、失独和生育周期中晚期再育意愿的实现;因地震造成的肢体残疾者群体的自强自立;地震造成的创伤应激反应的日常管理和自我消化;救灾过程中新催生的地方精英的嬗变演化。

地震创伤的日常管理和应对,是汶川地区受灾民众最长期的一个微观适应领域,涉及灾害风险感知、灾害预防措施采纳、家庭完整性维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纪念仪式等。另一方面,伴随着搬迁和重新安置,故乡概念发生了细微变化,地域认同感处于再生和修复状态之中;表现为分化的迁居意愿及其实施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处于分化社会结构位置的受灾民众与“模棱两可的”故乡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

^①罗家德教授的具体研究地点,是在阿坝州茂县太平乡的杨柳村,学名云村。关于云村灾后重建的基本事实,参见孙瑜(2014),以及罗家德、孙瑜、楚燕(2014)。

类微观适应行为,便是如何处理家庭成员的不期而逝:从城市中产阶级来看,领养地震灾区孤儿似乎是工具目标和价值目标相结合的一个理性选择,而对于灾区失独家庭来说,生育周期中晚期的再生育,则也是双重目标的结合:新生命到来,除了解除失独这一工具困境之外,是否也是灾后心理创伤弥合的一个独特疗法呢!另一个常见的微观适应类别,便是地震造成的肢体残疾者的康复和自强。中青院青红社工所服务的绵竹汉旺镇,便有一群因地震致残的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在外部专业社工力量的帮助下,走上自立自强道路。最后,我们还在各地救灾和恢复重建的案例中,看到了各种类型的地方精英,如何通过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和牺牲精神,成为新型社区领袖的案例。

参考文献:

- [1] Baverstock, Keith, and Dillwyn Williams. 2006. "The Chernobyl Accident 20 Years on: An Assessment of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 114(9):1312-1317.
- [2]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Sage.
- [3] Burawoy, Michael. "2004 ASA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1):1-28.
- [4] Gotham, Kelvin Fox, and Richard Campanella. 2013. "Constructions of Resilience: Ethnoracial Diversity, Inequality, and Post-Katrina Recovery, the Case of New Orleans." *Social Sciences*, 2(4): 298-317.
- [5] Harper, Krista M. 2001. "Chernobyl Stories and Anthropological Shock in Hungar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4(3):114-123.
- [6] Ludwig, Gerd. 2014. *The Long Shadow of Chernobyl*. Vienna: Edition Lammerhuber.
- [7] Ogburn, William F. 1966^[1922]. *Social Change with Respect to Culture and Original Nature*. New York: Dell.
- [8] Picou, J. Steven. 2009. "The Shifting Sands of Post-Katrina Disaster Sociology". *Sociological Spectrum*, 29(3):431-438.
- [9] Schaefer, Richard T. 2006. *Sociology: A Brief Introduction*. Six Edition. McGraw Hill.
- [10] Turner, Ralph, and Lewis Killian. 1984. *Collective Behavior*. Four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 [11] 刘能. 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个案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2] 刘能,高丙中,师曾志,陶传进. 联手的力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5·12”灾后重建公开招标项目评估报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3] 罗家德,孙瑜,楚燕. 云村重建纪事:一次社区自组织实验的田野记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14] 孙瑜. 乡村自组织运作过程中能人现象研究——基于云村重建案例[D]. 北京:清华大学博士论文.

责任编辑 黄杰

Disaster, Modernity and Social Change

LIU N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s a main case study, and combines other disaster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to clarify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disaster-based sociology research, namely the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and modernit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and social change. Huma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change, as well as human disaster prevention efforts, have become the two core contents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ity of disasters. Secondly,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within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mergency norms after the crisis, is also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sters and higher modernity. Thirdly, the entire social process of disaster relief is also an important occasion for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lower modernity and higher modernity.

Key Words: disaster; modernity; human prior activity; emergency norms; social change